

纪念福建省苏维埃政府
成立80周年理论研讨会

论文汇编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龙岩市委
龙岩市人民政府
中共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长汀县委
长汀县人民政府

2012年6月·福建长汀

目 录

“福建省苏”与中央苏区半壁江山	石仲泉(1)
土地革命时期一面光彩夺目的红旗	
——简述长汀在中央苏区时期的重大贡献	黄修荣(8)
毛泽东与福建中央苏区政权建设	林 强(16)
中央苏区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建立的重要意义及历史作用	王新生(23)
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黄 黎(28)
论福建苏区与毛泽东思想形成	
——从毛泽东七次到长汀的革命活动谈起	石维行 冯惠秀(37)
试论福建苏区集体合同制的推行与曲折	
——以陈云的《怎样订立劳动合同》为中心	张 侃(42)
福建苏区后勤保障问题的研究	陈卫平 王子钰(56)
红十二军组织沿革初探	韩京京(63)
中央苏区“红色小上海”长汀的经济建设及其历史地位	李文生(70)
中央苏区“红色小上海”的历史内涵和文化价值	汤家庆(80)
福建苏区经济建设的历史考察与若干经验	傅柒生(86)
伟大的实践,有益的借鉴	
——试论苏区时期经济建设的成就和对当代的有益借鉴	张鸿祥(95)
浅论中央苏区的财政建设	曾一石(103)
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辖区经济繁荣的原因分析	邓建芬(111)
中央苏区对外贸易研究	李元健(117)
福建省苏领导汀州市反“经济封锁”的历史功绩	康模生(123)
毛泽东根据地经济建设思想与中央苏区红色小上海	王园珍(128)
试论福建苏区的重大历史贡献和现实启示	刘云刚(134)
关于闽西、赣南两个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的比较研究	苏俊才(142)

闽西苏区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作用和贡献	曾汉辉(152)
论苏维埃政府人权保障的鲜明特点	钟健英(161)
浅谈省苏成立前后的闽西土地政策	石少菁(167)
论闽西苏区在农业生产中的创新及其启示	兰桂英(171)
试论土地革命对闽西客家传统社会的冲击	张佑周(178)
闽西苏区税收制度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游宝富(184)
福建省苏是怎样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	戴立丰(191)
长汀为什么会成为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詹世忠(197)
福建苏区革命斗争的历史条件及特点	吴明刚(202)
中国共产党在闽西苏区执政的一些启示	来永宝(209)
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研究	蔡天新(214)
论福建省苏维埃基层政权建设的基本经验	曾昭卫(224)
浅谈福建省苏的历史功绩以及对新时期各项建设的几点启示	黄明溪(230)
苏维埃共和国有法可依的新时代	
——以闽西苏区司法审判实践为视角	蓝松金(235)
福建中央苏区劳动法的制定与影响	吴升辉(241)
中共福建省委妇女部成立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及历史作用	张雪英(252)
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座丰碑	
——中央红色交通线的历史定位研究	赖立钦(258)
千条红军标语见证福建省苏维埃政权在永安的蓬勃发展	张丽华 刘启宏(267)
福建省苏与安南永苏区关系之我见	姚清地 林联勇(273)
浴血闽赣边 浩气留人间	
——中央红军长征后中共福建省委、省苏、省军区的战斗经历	陈伟田(281)
试论福建省委、省苏、省军区等机关迁移四都的原因	赖光耀(286)
张鼎丞对创建中央苏区的重大贡献	陈凤芳(293)
福建苏区廉政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陈杭芹(301)
从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成立看党风廉政建设	符维健(308)
浅谈中央苏区红色小上海与党的廉政建设	戴玉珠(313)
从人民群众主体地位认识和弘扬苏区精神	王盛泽(319)
弘扬伟大革命精神 永堡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黄春珍(325)

弘扬苏区精神 加强党性锻炼	温雪勇(330)
传承苏区精神 重塑新时期党的形象	陈 芬(336)
新形势下进一步弘扬苏区精神的思考	温晓燕(343)
浅谈瞿秋白的“苏区精神”	黄建良(350)
执政为民“长汀经验”之解读	张耀清(355)
试论“苏区精神”与“长汀精神”之共性	吴启蒸(359)
对福建中央苏区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的几点思考	毛立红(364)
弘扬福建苏区精神 发展长汀红色旅游	邓泽村(370)
浅谈汀州客家人对苏维埃革命的历史贡献	付进林(378)
略论长汀苏区的历史地位与苏区精神	丘有阳(383)
创造中央苏区形成红土地文化的时代价值	张 惟(390)
苏区社会教育与苏区精神	赖 军 刘 良(394)

“福建省苏”与中央苏区半壁江山

石仲泉

一、中国苏维埃运动：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之路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苏维埃运动一直是党史研究的热门点之一。近些年来，随着历史档案的不断公布，这个问题又引起人们的关注。有一种看法认为，既然苏维埃运动是斯大林提出“移植到中国”来的，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是错误的，因此，中国苏维埃运动不应当肯定。这种看法把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了，不能苟同。2005年10月在江西兴国召开“弘扬苏区精神理论研讨会”上，我为“苏区”正过名。在这里，也要为中国苏维埃运动再一次“正名”。

的确，中国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战略问题发生过激烈争论。1927年9月27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讲话，批评托洛茨基既要中国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又要进行苏维埃运动的观点指出：“把这两个不能相容的东西合在一起，就是不懂得苏维埃的本性和使命”，还是“让我们的中国同志自己去进行把苏维埃移植到中国的工作吧！”^①同年10月至次年3月，中共中央不断发表文告，指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主要任务“是要实行彻底的民权革命，”“在政治上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主独裁的政权——工农兵苏维埃”。^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秋收起义之后，党领导的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和以建立工农政权为主要目标的中国苏维埃运动，在神州大地兴起。中央苏区和“福建省苏”都是这个运动的产物。

应当怎样解读这段历史呢？能否因为有斯大林指示的背景就否定它呢？不能。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示有错误的，也有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如果全是错误的，中国革命可能会遭受更多挫折和痛苦。对于“把苏维埃移植到中国”来的意见，就其指出的革命方向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92页、第93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157页。

言,应当肯定。至于怎样“移植”,以及开展苏维埃运动的具体指示,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对于这段历史,我们更应该放开视野,从历史的长河来认识。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诞生?一个重要原因是古代中国很强盛,在5000年的文明历史上,它曾以世界上的头号富强大国“独领风骚”达1500年之久。但到近代,国家衰败了,西方和东方列强的10多次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遭受了巨大苦难,不仅被割去了数百万平方公里领土,而且以所谓“战争赔款”名义掠走了10多亿两白花花的银子。国不将国。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悲怆地呼号: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孙中山第一个喊出了“振兴中华”口号。这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民族复兴而前仆后继。中国共产党就是接过这个接力棒而横空出世的。它的使命,说白了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使命同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目标是一致的。或者说,只有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此,它先要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怎样进行这个革命?在大革命失败后,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共产党人只有“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志的尸首”,独立地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在城市,反动派的力量十分强大,共产党就到农村发动武装起义,进行苏维埃运动。搞苏维埃运动,并非完全是斯大林的指示。因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纲领上就明确了“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实行社会革命”。^①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都远离了革命,共产党要继续革命,只能进行苏维埃运动,没有别的选择。

广大工农大众是否愿意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进行苏维埃运动呢?他们深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为了生存,也只有这条活路。连不赞成革命的胡适讲到当时的农村情况都说:大多数农村所以破产,农民所以贫困,是由于国内政治不良,剥削太苛,搜刮太苦,负担太重。现时内地农村最感痛苦的,是抽税捐太多,养兵太多,养官太多。纳税养官,而官不能做一点有益于人民的事;纳税养兵,而兵不能尽一点保护人民之责。剥皮到骨了,骨髓全枯了,而人民不能享受一丝一毫的治安幸福。在这种痛苦之下,人民不逃亡、不反抗、不做共产党、不做土匪,那才是该死的贱种哩!胡适的这段话十分形象地说明:革命造反是官逼民反。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自己的革命政权,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就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由来。

中国苏维埃运动既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之路,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初始之举。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应当充分肯定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必要性、正义性和进步性。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二、福建苏区：中央苏区的半壁江山

福建地处东海之滨，岸线绵长，山林茂密，江河纵横，自然资源丰富。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入侵，封建地主阶级和军阀势力的反动统治，不仅严重阻碍了富饶福建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且给福建人民带来了无穷苦难。在闽西诸县，土地的85%至90%为地主阶级所有，农民所有田地不到15%。大量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只能租种地主阶级的土地而忍受苛重的封建剥削。广大农村凋敝和破败的情况愈益严重。许多百姓倾家荡产，啼饥号寒，甚至卖妻鬻女，流离失所。为了生存，他们只有一条路，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在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的领导下，1928年3月至7月，在闽西，先后爆发了龙岩后田暴动、平和暴动、上杭蛟洋暴动和永定暴动。在闽北，1928年9月和1929年1月，崇安、浦城先后爆发两次暴动，而且第二次比第一次的规模和区域更为广大，参加的人数更多。有了这样的革命基础，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在转战赣南后进入闽西，占领了长汀县城。在红四军前委的帮助下，召开全县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成立长汀县革命委员会，创建了福建省的第一个红色政权。5月，红四军二进闽西，将红色游击区域扩大到龙岩等6县。7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为发展和巩固闽西苏区奠定了基础。在红四军粉碎国民党军的三次“会剿”后，召开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闽西苏维埃政府。至1930年5月，闽西6县红色区域人口达85万，占闽西各县人口一半以上。

在闽西苏区发展的同时，福建其他地区的苏维埃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在闽北，以崇安、浦城为中心的苏区初步形成。1930年5月，崇安县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控制崇安大部、浦城西部、建阳北部以及江西邻县部分地区，下辖崇、浦等18个区苏维埃，人口达20多万。在闽南，平和暴动后，逐步创立了平和、饶平、大埔、诏安4县边界的红色区域。1929年6月，成立饶和埔诏苏维埃政府，红色区域扩大至漳浦、云霄等地。1932年2月，以漳浦小山城为中心的纵横百里，有30多个乡村的(南)靖、(平)和、(漳)浦红色区域发展起来。此外，在安(溪)、南(安)、永(春)、德(化)4县，至1930年底，形成了以安溪佛子格为中心的边区游击根据地。两年多后，又成立了安南永苏维埃政府，成为红色小苏区。在闽东，1931年下半年至1932年上半年，由中共福安中心县委领导的福安、寿宁、宁德、霞浦、福鼎、连江等县的革命斗争也出现了新的局面，参加平粵、除粮、减租的斗争，曾达到一二万人。该年底，参加群众性自卫武装组织的红带会(以大刀会公开形式组织的赤色武装)达到10万人左右。

随着福建苏维埃运动的风起云涌，在闽赣两地苏区打通之后，新成立的福建省委于

1932年3月18日在长汀隆重召开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这既是福建苏维埃运动取得伟大成就的结晶,也标志着福建苏区乃至整个中央苏区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

应当怎样认识福建苏区在中央苏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呢?至少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思考:

第一,福建苏区是中央苏区的半壁江山。按照中共中央1930年10月的设想,“我们现在确定湘鄂赣连接到赣西南为一大区域,要巩固和发展它成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想呢?一是这两个苏区的苏维埃运动相当高涨,革命力量较为雄厚。这年7月战斗在湘鄂赣苏区的红三军团先后攻克了岳阳和长沙两座城市,特别是攻克长沙,俘敌4000余人,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统治集团。10月初,红一军团回师江西,攻占了赣西南中心城市吉安,并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使国民党当局深感恐慌。二是当时正值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统治党中央的时候,急于要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这两个苏区距离湘鄂赣三省省会较近,便于当时中央要夺取武汉、长沙、南昌等中心城市的指导方针。在我看来,这可能是当时中央的主要考量。但是,由于这两个区域之间的反革命力量相当强大,且水陆交通都较发达,便于调动军队对付革命力量的发展。因此,这两大苏区始终未能连成一片。红三军团的主力后来也离开湘鄂赣,转战赣南和闽西,与红一军团并肩战斗,参与粉碎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围剿”。1931年4月,中共中央对中央苏区的区域作了调整,将闽西苏区划入中央苏区的范围。反“围剿”战争主要在赣南和闽西间来回穿插进行,这两个苏区随着战争的展开,在1931年10月后即连成一片。以赣南和闽西构建的中央苏区为依托,1931年11月宣布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是中央苏区正式建立的标志。至1933年秋,中央苏区进入鼎盛时期,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省和瑞金直辖市,共60个行政县(其中长期占有的县城24座),总面积为8·4万平方公里,人口为500万。

为什么说福建苏区是中央苏区的半壁江山呢?从鼎盛时期区域来说,这不仅是因为中央苏区所辖4省,福建苏区涉及两省,占一半;而且所辖县域,福建苏区占22个,占有的县城11座。从地域面积言,达3·5万平方公里;从人口看,福建省和闽赣省共200万。按照目前对中央苏区县认定情况来看,包括赣闽粤三省。据说,江西申报的中央苏区县为54个,福建为41个(还有广东的12个)。这也近乎一半了。因此,讲福建苏区是中央苏区的半壁江山,不为夸张之词。

第二,福建苏区是拱卫中央苏区的东部前沿。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的主要活动区域,就在赣南和闽西。1929年3月,在长汀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就决定在闽西、赣南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29页。

实行“公开割据”，作为“前进的基础”。这就孕育了后来中央苏区的蓝图。此后，红四军一直在赣南和闽西转战，并且在1929年这一年，红四军的重大活动和重要事件都是在闽西进行或发生的，如红四军的七大、八大和九大，就是在龙岩、上杭和古田召开的。1930年，闽西苏区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为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1931年进行的第二、三次反“围剿”战争，闽西苏区是主战场之一。随后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府虽然设在瑞金，但长汀实际上起着“第二红都”的作用。1932年4月，毛泽东率中路红军攻克漳州，对于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今年4月为纪念红军攻克漳州80周年召开的“红军进漳与中央苏区”理论研讨会上，学者们已经作了充分论述。它不但解除了中央苏区特别是闽西苏区的东面威胁，而且为中央苏区提供了极大的物资补充。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1933年7月至9月，彭德怀率东方军入闽作战，不仅收复了闽西北大片苏区，而且取得了“赤地千里、筹款百万”的重大胜利。12月，正式成立闽赣省苏维埃政府，统辖赣东、闽北地区。它除江西苏区的黎川等9个县外，主要包括福建苏区的崇安等15个县，全省面积达2万平方公里、人口100多万。这使福建苏区进一步成为中央苏区的东北门户和“战略的锁匙”。【页下注：《苏区中央局转中央对目前作战计划与任务的指示》（1933年3月4日），见《江西党史资料》第13辑，第32页。】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福建苏区是中央苏区东部第一道防线的主战场。它不仅是红七军团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的主要路线，而且其两个县——长汀和宁化，是驻在此地的中央红军进行长征的出发地。

第三，福建苏区为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作出了巨大的奉献和牺牲。苏区时期是党领导民主革命的一段革命环境最为艰难、斗争形势最为险恶、挫折和曲折最为频繁的时期。苏区人民对革命的奉献和牺牲是巨大的。就福建苏区言，据了解，目前还没有很完全的统计材料。但就从不完全的若干统计数据看，也是相当令人震撼的。比如，中央苏区政府部门下达的征集粮食任务，福建省的长汀、新泉等县和闽赣省的宁化、归化等县，采取各种办法，到9月初，福建省长汀等5县全部超额完成计划，全省共超过原定计划1万多担。另外，还筹集银元近200万元，布、草鞋4万多双，斗笠20万顶。闽赣省闽北苏区认购公债20万元，采办食盐1万斤。其中，闽赣省宁化苏区完成筹粮等多项任务都很突出。该县在1933年8月至10月捐粮14万担之后，1934年6月和8月又筹集了4万多担，有3个区获得省苏维埃政府授予的“筹粮模范区”称号。此外，还突击筹集货币15万元，银元10万元，布、草鞋1万多双，军衣1000多套送往前线。这些都为红军长征作了重要准备。

福建苏区人民为扩红也做出了巨大奉献。红军是穿了军装的农民，红军的兵源在人民。反“围剿”战争开始后，为了保卫苏区胜利果实，参加红军上前线，成为苏区青壮年男子的光荣。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后，实行义务兵役制，参加红军更成为青壮年男子义不

容辞的职责。从1932年春到1934年9月,福建苏区参加红军的达15万之多。牺牲的烈士有4·2万多人。如彭德怀所称赞的,先烈之血,浇成了革命之花。福建苏区人民同整个中央苏区人民一样,在那艰苦的岁月里,作出了震撼天地的奉献和牺牲,书写了光耀中华的伟大历史篇章。

三、弘扬苏区精神,不断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苏区精神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习近平同志在2011年11月4日纪念中央苏区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讲苏区精神所说: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这一精神既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共性,又显示了苏区时期的特色和个性,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新的升华。

从习近平同志的讲话言,弘扬苏区精神有多方面内涵。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不断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或者说,不断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弘扬苏区精神的长远奋斗目标。

什么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呢?中华民族在兴盛时期的疆域版图,在唐代是1000万平方公里,在元帝国时曾达到1500万平方公里,到清代康熙年间也有1300万平方公里。民族复兴是否要恢复那些被西方列强侵占和夺走的疆域版图呢?当然不是。1989年5月,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谈话说:“历史帐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页下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5页。】那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含义是什么呢?我以为,主要是使中华民族跻身于先进民族行列,为人类作出贡献的份额尽量象古代中国那样大。据《世界自然科学大事年表》记载,十六世纪以前,影响人类生活的重大科技发明约有300项,其中175项是中国人发明的。正是这些重大的发明(包括发现),使中国的农耕、纺织、冶金、手工制造技术长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历史前进了,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当代中国的科技的总体水平比古代中国不知要高出许多;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科技的总体水平与当代世界发达国家科技的总体水平相比却又落后许多。因而,实现民族复兴,就是要像当代发达国家那样对人类的贡献占很大份额。毛泽东在上个世纪50年代说: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我们这个国家要建设起来,完全改变过去100多年落后的那种状况,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你赶不上,那你不那么十分伟大。经过许多年,应该赶上人家,这是一种责任。“中国应当对于人类

有较大的贡献。”【页下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9页，第157页。】我国现在的人口翻了一番多，对人类的贡献要更大，任务就更加艰巨。这就是说，我们所讲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主要是在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率的意义上讲的。这是它的要义。既然如此，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不仅仅是一个复兴历史盛世，更重要的，或者准确地说，是超越历史的盛世。

当然，这是一个长期艰苦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个需要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特别是需要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不断接力奋斗的更伟大的愚公移山工程。这就需要我们弘扬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去努力奋斗。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土地革命时期一面光彩夺目的红旗

——简述长汀在中央苏区时期的重大贡献

黄修荣

长汀县是福建省的西部重镇,号称福建西大门,是一块经过血与火洗礼的红色土地。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马列主义就开始在这里传播,一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创办了《汀雷》、《长汀月刊》等进步刊物,宣传新思想,传播新文化。

在第二次国共革命战争时期,长汀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叶剑英、陈云、张鼎丞、邓子恢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从事过革命斗争。长汀当时还是福建苏区的首府,中共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省总工会、团省委均设在长汀。长汀成为红军的故乡,将军的摇篮。

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富于革命传统的长汀人民前仆后继,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在册烈士就有6760人,其中有50多位县(团)级以上的干部。作为土地革命时期一面光彩夺目的红旗,长汀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长汀是土地革命时期福建革命运动的政治、军事中心

1929年3月14日,红四军首次入闽。经过长岭寨一战,郭凤鸣旅被击溃,郭凤鸣本人在逃跑中被击毙。红四军于当天长驱直入占领了长汀城,“长汀果然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①这是毛泽东由创建井冈山这个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而在赣南闽西地区创建中国最为强盛、范围最为广阔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转折点,是毛泽东在井冈山创立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向“农村包围城市”这一中国革命道路理论迈出重要一步的历史转折点,当然也就是中国革命历史的转折点。

攻占长汀后,在短短的十七天中,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的领导下,红四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发动群众打土豪,组织工会、农会,为建立红色政权创造条件。在红四

^① ①[美]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88页。

军前委的帮助下,长汀迅速组建了20个秘密农协,5个秘密工会,相继成立了总工会,党的组织比以前发展壮大了两倍。

由于红四军深得民心,长汀的广大青年纷纷要求参军,短短半个月里入伍者达300余人。红四军还帮助地方建立了一支60余人的县赤卫队,并拨给20多支枪,以保卫地方政权和土地革命的胜利进行。

在长汀期间,红四军抓紧筹集军饷,解决给养,不失时机地展开筹款,不到10天便筹款5万余元,给每位官兵发了4元零用钱,官长、士兵一律平等待遇。同时用缴获的缝纫机赶制军衣4000套,每位红军战士都发到了两套缀有红领章的灰色军装、一顶缀有红五星的军帽、一幅绑腿布,这使得红四军自创建以来第一次统一了军装。

红四军入闽后,长汀的革命斗争形势一片大好。红军解放了长汀城,创建赣南、闽西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长汀县革命委员会。到1930年上半年,中共长汀地方组织先后领导南阳、涂坊、塘背、濯田、四都、汀东、古城等地农民暴动,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使20余万农民分得了土地。1930年5月18日,长汀县苏维埃政府成立。这标志着长汀苏区正式形成,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地方武装也日益壮大发展。至1934年10月,长汀先后有汀南赤卫武装;汀城赤卫军(赤卫队);张赤男率领的闽西工农红军第三路军;长汀赤卫团;汀东游击队;汀西游击队;汀流游击队;兆征县抗敌大队;少先队半军事化武装组织等。

3月中旬,根据前委罗福峰会议的决定,红四军进行了改编。团的建制改为纵队编制,共编为3个纵队,原二十八团改编为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党代表陈毅;军部特务营、独立营和二十八团一部改编为第二纵队,司令员胡少海,党代表谭震林;三十一团改编为第三纵队,司令员伍中豪,党代表罗荣桓。每纵队下辖两个支队(相当于营),每支队下辖三个大队(相当于连)。朱德为军长,前委书记毛泽东兼任党代表、军政治部主任。

6月13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即“汀州会议”),红四军一、二、三、四纵队的负责人和闽西特委的领导邓子恢参加了会议。

“汀州会议”根据中央关于当前形势和红军扩编的指示,进行了认真讨论,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认为整编红军的目的是集中红军主力,由游击战转变为运动战,消灭大一些的敌人,夺取一些中小城镇,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

6月19日,红四军、红三军、红十二军正式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为红一军团),辖红三军、红四军、红十二军。毛泽东任军团政治委员,朱德任军团长、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团约计一万余人。在长汀的南寨广场召开大会,正式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的成立。红一军团的成立是闽、赣两省人民英勇战争的结果,是共产党领导下苏区武装力量发展壮大的标志。

1931年9月,中共闽粤赣省委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等机关都设到长汀城。同年11月,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毛泽东任主席。长汀苏区成为赣南、闽西之间的纽带,长汀成为中央苏区的中心城市。

1932年3月18日,经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批准,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长汀召开,成立了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张鼎丞被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下设内务、文化、土地、财政等八个部。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是毛泽东政权建设理论在福建的一次成功实践,是全中国和福建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苏区的革命斗争和建设进入了全盛时期,长汀成为中央苏区的中心城市,同时是福建省红色区域的首府,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

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使福建苏区有了统一的工农民主政权,省苏的中心任务是,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军事、土地、财政、经济的革命,为夺取革命战争胜利奠定了物质的基础。在军事上,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积极领导扩大红军,拥军支前,巩固政权的工作。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不到半月,即配合中央红军东征,毛泽东率东路红军,一举攻克漳州。

与此同时,共青团福建省委在长汀成立,书记陈荣。福建省政治保卫局也设在长汀,福建省职工联合会也设在长汀最繁华的水东街。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和副委员长陈云经常来这里指导总工会和长汀工会的工作。长汀各企业都成立了工会组织,使工会成为苏维埃时期的一支强大力量。

1932年2月福建省军区在长汀成立,司令部设在城郊师福村赖宅,罗炳辉、谭震林、周子昆、叶剑英、龙腾云先后担任军区司令员,军区下设杭永岩、宁清归、汀清连3个军分区。福建省军区成立后主要担负建立地方武装组织和军事训练,配合各级政府开展扩大红军、组织、人民支援革命战争等重大任务。

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在长汀成立,苏区福建省委、省军区迁设长汀,使长汀成为福建省革命斗争的政治、军事中心,对统一全省革命斗争的领导和推动闽粤苏区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长汀是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红色小上海”

土地革命时期的长汀,不仅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

长汀城由于汀江航运的便利,成为闽西、闽南各县的物资集散地,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之一,工商业发达,市场繁荣,人们称为“红色小上海”。

为了促进长汀经济建设的发展,党和苏维埃政府首先加强了长汀交通、邮电事业的建设。

对于长汀与外地主要交通联系的汀江航运,福建省苏维埃非常重视汀江水道的整治工作,曾由内各部主持召开县、市、区交通科长联席会议,决定组织成立汀江河道修理委员会,并向船老板、商人募捐大洋2元,用于修治河道。为了发展航运事业,在汀城、水口

成立了修船和造船两个厂,厂长黄兴发,共有工人 200 余人,平均每 3 天可造一只木船。不但解决了本地船只缺少的问题,还可把船只出卖给武平、上杭等县。

长汀通往各县的陆路本都是羊肠小道(清代称官道),崎岖不平。各级苏维埃政府非常重视整修道路,每年都利用冬闲发动群众修路。

长汀苏区的经济繁荣昌盛,在农村,解放农村生产力,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当年长汀、汀东濯田等县区的兴修水利和开垦荒地,曾受到《红色中华》报的表扬。在城镇工商和金融方面,成绩更为显著。1929 年,中央军事委员会临时被服厂(红军被服厂)在长汀设立。1930 年,中华织布厂在长汀建成。同年,中华苏维埃贸易公司、中华纸业公司等商业机构设在长汀,分别经营棉布、烟叶、香菇、泽泻、钨砂、废铜旧铁等地特产品和土纸贸易,通过收购远销,打开商业门路,换回根据地需要的商品,满足市场供应。纸业公司为了搞活贸易,采取发动生产资金的办法订购土纸,促进了产品质量的提高,达到购销两旺。1931 年,红军斗笠厂在长汀设立,日产斗笠 1000 多顶。1932 年,中央苏区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来到长汀筹办福建分行,并附设溶银厂。这些金融机构为组织资金,发展生产,搞活经济作出很大成绩。福建军区兵工厂、军区后方医院、中华贸易公司福建省分公司、闽西列宁书局也设在长汀。在长汀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在这批骨干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影响带动下,公营、私营、公私合营的工商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先后办起了樟脑厂、熬油厂、炼铁厂、斗笠厂、熬盐厂、弹棉厂,成立了长汀粮食调剂分局、县、市(区)信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供销社等经济组织,以及造纸、织袜、烟丝、雨伞、木器、竹具、农具、石灰、砖瓦、陶瓷等二十多种的手工业生产单位。红色旅馆、饭店等服务行业也搞得很活跃。据统计,长汀城有各种商店 378 家,8 个公营工厂,50 余个生产合作社,水东街的大小商店(摊点)就有一百多家。另外,在长汀还开辟了两处红色市场,单大米一项,每天交易达六、七万斤。赶集的商人、百姓上万人。

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苏区政府大力发展对外贸易。苏区对外贸易主要是对国民党统治区的贸易,长汀是苏区发展对外贸易的重镇。1933 年 2 月,长汀各级对外贸易局成立以后,采取了严格控制现金出口,加强现金管理;简化出境手续,提高外贸工作效率;进出口商品一律减税一半等办法,来加快进出口商品的流通。大宗的粮食、土纸、大豆及杉木、竹、烟叶、香菇、樟脑、红糖等土特产,通过白区商人打通关系,可大量组织出口。同时进口苏区急需的食盐、煤油、西药、棉花、棉布、印刷油墨、电话电报材料、手电筒、电池等。市场贸易兴旺,沟通了长汀与瑞金、石城、会昌、宁化、上杭等县的经济联系,使长汀成为赣南、闽西主要农副产品的集散地。长汀的市面呈现一片繁荣景象,成为中央苏区的商业重镇。

财政、金融是加强经济建设的基础。苏区政府决定在长汀设立闽西工农银行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福建省分行。闽西工农银行是工农群众自己集资创办,为自己谋利益的

银行。银行资本根据闽西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决定为 20 万元,分为 20 万股,每股 1 元,由各级政府、各工会、各部队组织募股委员会,负责募集。银行成立以后,业务范围包括存、放款,汇兑、期票、买卖金银,发行纸币,铸铜片,兼营储蓄业务。由于工农银行有充足的银行基金,因此,发行的苏币信用很高,币值相当稳定,群众乐于使用。

1931 年冬,闽西工农银行为了扩大经营进出口贸易,在长汀最繁华的水东街增设营业部,办理进出口贸易。对进口布、棉、盐、煤油、出口粮食、土特产品的公营或私营商店给予优先贷款。1932 年夏,中央政府在长汀成立了中华商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进出口商品所需要的贷款,也由闽西工农银行营业部承担。闽西工农银行对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繁荣苏区经济,保证军需民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还创办了四都兵工厂,濯田炼铁厂、熔银厂、造船厂、熬盐厂、樟脑厂、砖瓦厂、石灰厂、造纸厂等。总之,长汀的手工业、公营工业,占了整个苏区工业的一半,是一个主要的手工业、公营工业城市,为苏区的巩固、发展,保证供给军需民用物资,支援革命战争等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1 年,长汀已成为中央苏区重要的经济中心。长汀福音医院也成为中央苏区最大的一所医院。许多中央领导人和红军指战员前来这里治疗。许多中央领导人和红军指战员前来这里治疗。

1932 年 1 月,傅连璋按照毛泽东为红军培养医务人员的指示,在长汀城创办了中央苏区第一所“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看护学校”。不久又办了中央红色医务学校。

在毛泽东的根据地经济建设思想的指导下,长汀苏区的经济繁荣昌盛,以发展农业、工业、对外贸易和合作社为中心的苏区经济建设出现了崭新的局面。长汀苏区的经济发展,对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稳定人民生活,保障中央苏区的物资供应,促进整个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很大贡献。

(三) 毛泽东在闽西长汀等地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新探索

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一条完全不同于苏联城市武装起义革命道路的,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开辟出来的。最初的实践起源于井冈山的“工农武装割据”,萌发于在长汀十七天的思考,即中国革命应当先占领农村,而后及于城市,形成于古田会议之后写就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这里毛泽东进一步批评了党内普遍存在的主张流动游击,忽视建立巩固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强调了它对于夺取全国政权的意义。

1929 年 5 月 19 日,毛泽东率红四军从瑞金出发二次入闽,经长汀古城、四都、濯口,于水口跃进汀江,在龙岩、上杭、永定开辟了一片天地,为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宏伟蓝图写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红四军进军闽西后的全新局面,冲开了阻碍

历史发展的层层迷雾。

1929年3月20日,也就是朱毛红军占领长汀后的第7天,毛泽东在长汀辛耕别墅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研究了南方各省的政治经济状况和革命的主客观形势,针对蒋桂战争即将爆发的有利时机,提出了红军目前的行动方针。会议站在全国的高度,认为目前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要猛力的夺取群众”,除“工农外,兵士群众的夺取,也非常重要”。“宜在江苏直隶,红军小区域苏维埃个数增多,这不仅在湘赣闽等地,江苏北皖鄂北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会议还指出,“福建全省,浙江全省,赣东赣南两区,统治阶级的军力非常薄弱……首先创造公开割据。”根据这样的考虑,会议还确定了红四军、红五军以及江西红二团、红四团的行动,即“在国民党奋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在毛泽东看来,作为国民党阵营两支最大势力的蒋、桂军阀混战,为朱毛红军创造一个比井冈山更为宏大的“割据区域”计划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因为,国民党新军阀内部的分裂和战争,是共产党“工农武装割据”获得发展的重要前提。

当天,毛泽东在长汀代表前委写了《前委致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简称“三二〇报告”),总结了游击赣南、闽西一路调查研究的实际情况,从而向党中央提出了一个坚定而大胆的战略设想:“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并强调:“这一计划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①从这次会议的精神及毛泽东代表前委所写的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站在全国的角度,以科学的观点和洞察力分析了形势,特别是南方各省的局势,正确地抓住了国民党内战的有利时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红军的战略计划和行动方针。

这表明毛泽东已经在井冈山时期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道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开始萌发了中国革命应当首先占领农村,而后及于城市的思想。随后毛泽东于1930年1月5日在上杭古田赖坊协成店所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1930年5月在长汀出版的《调查工作》中,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观点。首先,认为“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烧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问地是不远了。”“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头的一只帆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页。